

中国古文献学史

上册

孙钦善 著

中华书局

中国古文献学史

下 册

孙 钦 善 著

中 华 书 局

责任编辑：崔文印

中国古文献学史

(全二册)

孙钦善 著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桥中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1/32·40³/。印张 933千字

1994年2月第1版 1994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定价：42.00元

ISBN 7—101—00942—5/K·381

绪 言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丰富的古代文化遗产。在这丰富的古代文化遗产宝库中，文献典籍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数量之多，世界罕见，人们常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来形容，这并非夸大之词。但更可贵的是，我国不仅有丰富的古代文献典籍，还有着研究、整理这些文献典籍的悠久历史，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总结了有益的方法和理论，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古文献学，这对于我国古代文献典籍的保存、整理、流传和运用，起着重要的保证作用。历史给我们以启示：能否继承和发展中国古文献学，是关系到我国丰富的古代文献典籍的存亡问题。如果没有正确的古文献学理论和方法，古文献将会产生两种后果：或者任其错乱、散失，日渐佚亡；或者乱加整理、妄加窜改，贻误后人。这将对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人类文明发展，产生难以估量的损失。

什么是古文献学？简言之，就是有关古代文献典籍整理和研究的学问。为了不停留在抽象的定义上，进一步加深对古文献学的了解，不访让我们考察一下历史和现实的实际经验。由于古代文献典籍内容和形式的复杂性所决定，研究、整理它们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和技能。于此前人早已有经验之谈，如清代古文献学著名学者戴震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说：

僕自少时家贫，不获亲师，闻圣人之中有孔子者，定六经以示后人。求其一经，启而读之，茫茫然无觉。寻思之久，计于

心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求所谓字，考诸篆书，得许氏《说文解字》，三年知其节目，渐睹圣人制作本始。又疑许氏于故训未能尽，从友人假《十三经注疏》读之，则知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至若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诵《周南》、《召南》，自《关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协韵，则齟齬失读；诵古《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于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而字学、故训、音声未始相离，声与音又经纬纵横宜辨。汉末孙叔然创立反语，厥后考经论韵悉用之。释氏之徒从而习其法，因窃为已有，谓来自西域，儒者数典不能记忆也。中土测天用句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线，其三角即句股，八线即缀术，然而三角之法穷，必以句股御之，用知句股者，法之尽备，名之至当也。管、吕言五声十二律，宫位乎中，黄钟之宫，四寸五分，为起律之本，学者蔽于钟律失传之后，不追溯未失传之先，宜乎说之多凿也。凡经之难明，右若干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讲。僕欲究其本始，为之又十年，渐于经有所会通，然后知圣人之道，如悬绳树槩，毫厘不可有差。

这里虽就攻读经书的体会而言，实际上概括了研读、整理古代古籍典籍所须具备的全面知识，其中包括文字、音韵、训诂、名物、典制、天文、地理、算法、乐律以及思想义理的剖析等等。以上还仅限于从古代文献典籍的书面语言形式及其所表达的具体内容的角度看问题。如果从古代文献典籍整理工作的主要环节来看，又须掌握

目录、版本、校勘、标点、注释、辨伪、辑佚、编纂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如此说来，古文献学岂不是包罗太杂了吗？以一个人的精力又怎能兼而通之呢？博杂确是事实，因为它不能为其中任何一方面的知识所穷尽、所代替。但是它也不是各方面知识的简单拼凑，而是有轻重主次之分，这样兼通也就并非不可能。概括言之，古文献学以古代文献典籍的形式内容和整理它的各个环节如校勘、标点、注释、辨伪、辑佚、编纂等为骨架，构筑了所需要的古代语言文字、古籍目录版本、古代历史文化等有关知识，以及运用这些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其中各类知识占据的位置并不是平列的，而以古代语言文字学为基础，传统一直把“小学”作为“通经”的工具，传统“小学”一直是经学的附庸，正说明这个道理。基础虽然重要，但不能代表全部，如果认为古文献学仅限于古代语言文字学，而不须兼顾其他，那也是一种片面认识。传统又有所谓“校讎学”之称，其始仅限于校勘之义，出自刘向《别录》。后又流为校理群书，进行编目之义，如郑樵《史通·校讎略》及章学诚《校讎通义》所述，实已与目录学无异。以上二义皆狭，也不足以概括古文献学的内容。

古文献学实际上是一种综合性的边缘学科，它与古代语言文字学、古籍目录版本学以及古代历史学（包括通史、文化史、哲学史、思想史等）都有关联。同时古文献学又是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古文献学本身又有许多分支，诸如注释（包括字词的注音释义及天文、地理、名物、典制等的考证辨析）、校勘、目录、版本、辨伪、辑佚、编纂等，可见它是一个成熟的学科。古文献学不仅为研究、整理古代文献典籍的专门学者所必修，对于古代学科的研究者来说，也是需要加以掌握的，因为它关系到对史料的驾驭、精通和考辨。甚至对一般需要阅读古书的人来说，知道一些古文献学的知

识也是必要的。因此古文献学又带有基础学科的性质。

中国古文献学源远流长。中国古文献学史的任务是研究中国古文献学产生、发展的历史,介绍中国古文献研究、整理的历史概况,总结历史上古文献学家的经验和成果,为当今的古文献研究、整理工作提供借鉴。任何一种学术都有一个历史发展、积累的过程,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必须在前人已经取得的经验和成果的基础上开拓前进。否则就会陷入暗昧,多绕弯路,甚至可能误入歧途。由于各种学术的具体性质各不相同,因此对各种学术历史遗产的消化和继承,实际做法又不尽相同,大致说来,有的比较直接,有的比较简接。就古文献学而言,不少历史经验、方法和成果,古为今用的关系更为直接,因此能否充分发掘、总结、继承古文献学的遗产,取得借鉴,对古文献的发展来说,尤其显得重要和迫切,不仅关系速度的快慢,而且关系到水平的高低。我们必须重视这项基础工作,切切实实把它做好,以利中国古文献学的承前启后,发扬光大。

前面已经讲到,古文献学是一门综合的边缘学科。由此决定,古文献学史也必然是一门综合的边缘学科,它与语言学史、文学史、史学史、哲学史、文化史、思想史等都有关联,必须从横向联系上加以研究,并注意吸收有关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反其他史学也与古文献学史密不可分,例如传统小学总是依附于古文献学的,两者的发展历史是相辅相成的。又如古代史学史、哲学史、思想史等也都与古文献学史关系密切。史学史中的史书整理史部分直接构成古文献学史的内容。哲学史、思想史脱离不了经学史及诸子文献的整理史,而经学史及诸子文献的整理史也直接构成古文献学史的内容。

中国古文献学史具有自己的独特特点:第一,中国古文献学随着古文献的产生、流传和积累不断发展,形成一条源远流长、延绵

不断的历史。第二，中国古文献学史以经学史为中心。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由于儒家思想被奉为正统，经学也就自然形成古文献学乃至整个学术的中心，因而经学史也就成了古文献学史的中心。前面已经提到，经学几乎与整个思想史有关。经书文献随着历史的发展，被各个时期各种学者根据不同的目的、运用不同的方法整理着，研究着，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形成一层又一层的各个时代的历史遗迹，产生了汉学、宋学、清代考据学等不同的流派。第三，中国古文献学史虽然流派众多，但从基本倾向上分只有两派：一是考据学派，一是义理学派。前者从语言文字、名物典制等的考据入手，以求掌握古文献的本来意义，恢复古文献的原始面貌。后者往往摆脱语言文字，为我所用，穿凿附会，甚至任意篡改，强就我意。陆九渊所谓“六经注我”，确切地说明了义理学派的特点。前者能给古文献学提供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而后者则否，只能产生背离古文献本义借题发挥的新的思想成果，成为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但这只是就基本倾向而言的，具体到某一学者，往往不那么单纯，可能两种情况兼而有之，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第四，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传统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由于“经学中心”思想的影响，经籍的整理、研究成果最多，其次是史籍、子书，集部书除一些名家外，整理得最差。因此中国古文献学史所涉及的古文献整理、研究成果的范围，也只能受这种客观情况所限制。另外子部书内容、性质比较复杂，既包括一般思想著作，又包括非常专门的兵书、农书、医书、科技书、占卜书等，整理、研究起来，虽与一般著作具有共同性，但又需要某方面的专门知识，因此一般学者往往难以兼任。西汉刘向校理群书时，他自己只能负责经传（相当于后来四部分法的经部）、诸子（相当于四部分法子部中的思想著作）、诗赋（相当于四部分法的集部）三部分，而把一些专门的书分别请有关

专家整理(当然这样的专家也必须兼通古文献学),如“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汉书·艺文志序》)。因此中国古文献学及中国古文献学史所涉及的文献典籍范围也以经、史及子书中的思想著作、集部书的诗文词为主。至于近古兴起的白话小说和戏曲,不为古代正统学者所重视,虽然也被传抄校刻,但始终未纳入古代古文献学研究的范围,所以古文献学史对这类文献涉及较少。比较特殊的佛教文献、道教文献也是如此。

中国古文献学史与中国的政治史、思想史关系密切而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因此中国古文献学史的分期必须以依据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为主,同时参照政治史、思想史等方面的情况。传统经学史有所谓汉学、宋学、清代朴学等说法,也值得作为中国古文献学史分期的参考。中国古文献学史是贯穿古今的,本书只讲古代及近代部分——自先秦至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现、当代部分另行总结。古代至近代的古文献学史,大致可分为以下六个时期:先秦(含秦在内)、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含辽、金)元明、清及近代。先秦是我国古文献学的初创时期;两汉是成熟时期,既有以义理为主的经今文学派,又有以考据为主的经古文学派;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承汉朝古文学考据之余绪,南方受玄学影响较大,出现义疏之学,喜谈义理,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并且由于语言文字的发展,出现了知今昧古、以今类古的倾向;隋、唐集南北朝之大成,使南北分立的古文献学得到统一。唐疏在形式上是南朝义疏之学的继承,实际内容却以考据为主。史注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脉相承,均以考据为主。隋唐时期古文献学的特点是因循、集成,而较少开创;宋元明疑辨思潮兴起,以理学为代表的义理之学为主,同时考据学也在不断发展;清代集前代考据学之大成,形成

以小学为中心的一代朴学,虽亦有汉、宋之争,但宋学在学术上始终未成气候。近代开始之际,今文学虽又一度兴起,但整个近代仍承考据学传统,古文学一直是占优势的。综观整个古文献学史,汉、唐、宋、清是四个重要时期。汉学(以古文学的考据传统为代表)和宋学(以义理之学为代表)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传统。而清朝是个集大成的时期,它尤其是考据学发展的高峰,给我们留下丰富的经验和成果。

参照古文献学史的分期,本书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清及近代七章。除第一章外,其余每章第一节为概述,分专题介绍本章所含朝代古文献学的概况,其余各节论述该时期有代表性的古文献学家,以求点面结合,得以反映每一时期的概观。同时注意前后照应,以期反映古文献学发展的脉络和规律。

中国古文献学史目录

绪言	1
第一章 先秦	1
第一节 夏商周时代文献典籍的产生、保存和整理	1
第二节 我国古文献学的开拓者孔子	3
第三节 孔子后学与古文献整理	23
第四节 先秦诸子与古文献学	27
第五节 秦始皇焚书坑儒及其对先秦文献流传的影响	40
第二章 两汉	43
第一节 概述	43
一、政治思想概况及其对古文献学的影响	43
二、秦火之后先秦文献典籍在汉代的流传整理情况	46
三、经今古文学	57
四、纬学与纬书	74
第二节 董仲舒	83
第三节 司马迁	91
第四节 刘向 刘歆	102
第五节 王充	115
第六节 许慎	127
第七节 郑玄	149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	169
第一节 概述	169
一、政治概况及其对古文献学的影响	169
二、魏晋玄学的产生及其对古文献学的影响	172
三、汉语言文字和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及其对古文献学的影响	174
四、古书四部分类的确立及经史子集各类书籍的整理概况	181
五、魏正始三体石经的刊刻和汲冢竹书的发现与整理	190
第二节 何晏 王弼	203
第三节 虞翻 王肃	216
第四节 韦昭 杜预	228
第五节 本时期的史书注家	249
第六节 颜之推	297
第四章 隋唐五代	313
第一节 概述	313
一、政治概况及其对古文献学的影响	313
二、在思想上儒、佛、道并重及其对古文献学的影响	316
三、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及其与古文献学的关系	318
四、由信伪到辨伪	327
五、本时期四部书整理概况	329
六、壁经、石经及雕版刻经	331
第二节 陆德明	335
第三节 孔颖达贾公彦等与诸经疏	349
第四节 颜师古	396

第五节 《文选》注家李善及“五臣”	416
第六节 刘知几	440
第七节 司马贞 张守节	460
第五章 宋辽金	483
第一节 概述	483
一、政治概况及其对古文献学的影响	483
二、宋代疑辨之风的兴起和蔓延	486
三、宋代思想学术流派与古文献学的关系	490
四、语言文字学的成就及其对古文献学的影响	499
五、各类文献研究整理概况	503
第二节 欧阳修 曾巩	522
第三节 王安石	545
第四节 郑樵	568
第五节 洪迈	593
第六节 朱熹	614
第七节 廖莹中、岳氏及其他校勘家	638
第八节 王应麟	657
第九节 王若虚	674
第六章 元明	687
第一节 概述	687
一、政治概况及其对古文献学的影响	687
二、思想、学术概况及其对古文献学的影响	689
三、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及其对古文献学的影响	693
四、校刻古书改窜之风的兴起	694

五、各类文献研究整理概况	695
第二节 胡三省	704
第三节 王守仁	718
第四节 杨慎 焦竑 陈第	731
第五节 宋濂 梅骞 胡应麟	775
第六节 方以智	803
第七章 清及近代	831
第一节 概述	831
一、政治概况及其对古文献学的影响	831
二、清、近代古文献学的特点和分期	833
三、清、近代古文献学在各个方面的成就	835
四、本时期经、史、子、集各类古文献的整理概 况和主要成果	853
第二节 顾炎武	864
第三节 黄宗羲 王夫之	875
第四节 阎若璩 胡渭 姚际恒	894
第五节 惠栋 王鸣盛	929
第六节 江永 钱大昕	942
第七节 戴震	969
第八节 段玉裁	989
第九节 王念孙 王引之	1020
第十节 卢文弨 顾广圻	1047
第十一节 章学诚 崔述	1075
第十二节 龚自珍 魏源 康有为	1121
第十三节 俞樾 孙诒让	1179
第十四节 章炳麟 王国维	1216

第一章 先 秦

第一节 夏商周时代文献典籍的产生、 保存和整理

从现有史料来看,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代。但汉字的产生,要比此久远得多。汉字发展到商代后期,已经基本成熟,其前必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它的萌芽状态一直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时期陶器上的简单文字。应该说用文字记载的文献,是与文字同时产生、相随发展的,但见于历史记载的,也只能追溯到夏商时代。《国语·晋语四》说:“有夏商之嗣典”,《左传》、《墨子》屡引《夏书》、《殷书》(或《商书》)。《尚书·多士》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伪孔传:“言汝所亲知,殷先世有册书典籍,说殷改夏王命之意。”这是说殷先人有记载殷革夏命的文献典籍。《吕氏春秋·先识览》载:夏桀暴乱,“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说明夏代已有“图法”,即文献典籍。至于《周礼·春官》所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所谓三皇五帝皆属传说时代,无信史可言,其有无文字、典籍,同样可疑,这里说的三皇五帝之书,恐怕是后人附会追记之书。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我国最早的文献,当推商代的甲骨卜辞。这是一种镌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占卜文献,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其特殊性,当时为太卜一类的官所掌,但由此并不难推想当时史官所写的纪事较详的文献。《尚书》中有所谓“虞书”、“夏书”、“商书”,但

成文时代可疑,不仅“虞书”不可靠,即使“夏书”、“商书”也不能简单地看成夏、商时代文献的原貌。至于周代的文献,除铜器铭文之外,见于典籍流传的,也能看到,如《尚书》、《逸周书》中的可靠篇什、《周易》本经(六十四卦及卦、爻辞)、《诗经》、《仪礼》等。

春秋时代以前,文献典籍主要集中于官府,由有关的官吏掌管。如史官掌政典、史籍,《周礼·春官》载:“大(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内史掌书王命,遂贰之(郑玄注:副写藏之)”,“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郑玄注:志,记也。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梲杌》),掌三皇五帝之书”。《左传·昭公二年》载:韩宣子聘于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昭公十二年又载:楚灵王称赞其左史倚相为“良史”,“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古代书籍。每当一朝丧乱之际,史官们还往往带着他们所掌管的文献典籍投奔新主。《吕氏春秋·先识览》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又如太师、小师掌乐谱、诗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聘鲁,请观周乐,听到乐工演唱《诗经》乐章。此外如宗伯掌礼书,太卜掌三《易》,医官掌医典,司马掌兵书等等。这种情况到春秋后期开始改变,学术、典籍渐散民间,乃至边远部族,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世迁代移,文献典籍在流传中难免不发生散失、错乱,积时久远,又难免不产生语言文字上的障碍,于是对于前代文献的校勘、诠释、考辨等方面的整理任务便又自然地提了出来。最初,掌管文献典籍的有关官吏兼做这种整理工作。我国有史记载的最早的一

个知名的校雠家，是周宣王时的宋国大夫正考父。《国语·鲁语下》：“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以《那》为首。”《毛诗·商颂·那小序》：“《那》，祀成汤也。（宋）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父）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大师，以《那》为首。”《毛诗·商颂谱》：“自从政衰散亡，商之礼乐七世至戴公，时当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以《那》为首，归以祀其先王。”正考父是孔子的先人，《左传·昭公七年》载孟僖子说：“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上卿）兹益共（恭）。”此为经古文说，比较可靠。《史记·宋微子世家》：“太史公曰：……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则认为正考父为宋襄公时人，《商颂》非其所校而为其所作。此盖本今文《鲁诗》说。《史记索隐》于此有辨：“今按《毛诗·商颂序》云：正考父于周之大师得商颂十二篇，以《那》为首。《国语》亦同此说。今五篇存，皆是商家祭祀乐章，非考父追作也。又考父佐戴、武、宣，则在襄公前且百许岁，安得述而美之？斯谬说尔。”故可断定《商颂》非正考父所作，只是经过他的校理而已。但是《商颂》文字不古，篇幅较长，亦非商代古辞，当为商之后人追颂先王先祖之作。

第二节 我国古文献学的开拓者孔子

从春秋后期开始，随着社会的大变革、旧贵族统治的衰落，由官府垄断文化的情况逐渐改变。教育、学术下移，九流百家兴起，不仅产生了新的诸子著述，也出现了私家整理前代文献典籍的情况。孔子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